试论《资本论》哲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杨 洪 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就其主题、方法、内容、观点、成果等而言,中国《资本论》哲学研究已经具有了自身的鲜明特色。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包括基本立场、研究对象、主要方法、理论意旨等要素。其中,中国特色这一基本立场的形成,依附于中国道路的实践经验,表现在比较研究与学术对话中。相应地,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只限于《资本论》的笔记、手稿、定稿、书信,更应囊括中国道路之于《资本论》思想精髓的检验与发展。实现文本思想与中国道路的有机结合,离不开现实问题的导向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方法论依据,例如,研究逻辑与叙述结构的变迁,观照与把握社会和历史的方法,当今现实问题的破解之道,《资本论》当代价值之重估等。不仅如此,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还应置于世界历史发展中并产生意义,方可具备完整的形态。

关键词:《资本论》哲学;中国特色;中国道路;现实问题;世界历史

中图分类号:A 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2)01-0042-10

作为马克思思想的一座“高峰”,《资本论》自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后,伴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迅速在理论界和思想界引起了较为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以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推介《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与主要内容为起点,经由历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百余年的努力,中国《资本论》哲学研究业已呈现“燎原之势”,可谓体现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最高水准。检视中国《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历程,不论是主题与视野、方法与内容,还是思路与观点、成果与贡献,都表明它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显现出“《资本论》哲学中国特色”的征兆。当然,《资本论》哲学研究的中国特色,虽始于相关概念的提出,却绝不止于概念间的推演,而应构筑于现实的社会条件之上。对其基本立场、研究对象、主要方法、理论意旨的深入澄清与系统解答,是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前提性工作。

一、在比较研究中彰显出中国特色

不言而喻,中国特色是中国《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这一基本立场的形成,构筑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发展上,从而实现理论的“自我主张”,体现在比较研究与学术对话中。如若不然,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就会沦为封闭僵化的体系乃至抽象空洞的口号。因此,从整体上把握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本状况并甄别高下,《资本论》哲学研究方可自信地宣称“中国特色”。

经典著作的传世地位及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始于其“出道”之时。《资本论》第一卷德文初版甫一问世,即成为当时思想论战的焦点。围绕它的哲学思想的阐释,尤其是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关系,马克

收稿日期:2021-09-11

作者简介:杨洪源,男,河北黄骅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9CZX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思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鸣,并持续至今、经久不衰。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国外理论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设与反思为主要线索,形成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资本论》研究范式。

一是"传统体系"内的初步阐释。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建构更利于它的传播与宣传这一深刻认识,恩格斯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初版行将付梓之际,即已向马克思提出凝练标题、细化内容、剔除说明、概括主旨等建议,以便降低读者的理解难度①。尔后,在整理、出版《资本论》各卷次的过程中,恩格斯尤为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等,进行了许多的创造性阐发。这些工作既有力地批判了将《资本论》简化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或利益决定论的片面倾向,又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思想内涵。同一时期,"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也对《资本论》作了多元路径的体系阐释与系统宣传。伯恩斯坦主导的经济决定论的延续,狄慈根和拉布里奥拉代表的辩证方法解读,卢森堡和希法亭开创的时代意义阐释等,共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体系下的《资本论》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资本论》哲学"传统体系"阐释范式的形成过程中,列宁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基于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整体性,马克思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结合,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和科学检验,辩证法、认识论及逻辑学的有机统一等深刻认识,列宁所作关于《资本论》的重要论述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他本人所指出的,经由 1848 年欧洲革命的检验,特别是《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史观从首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②,转变为已经得到科学证明的原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苏联的全面确立,《资本论》哲学研究发展为"苏联模式"这一国家行为,涌现出一大批文献研究和思想史发掘方面的"扛鼎之作"。举凡: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写的《围绕马克思〈资本论〉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史概论(1867-1967)》;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编的《〈资本论〉哲学与现时代》;维戈茨基的《〈资本论〉创作史》和《卡尔·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论〈资本论〉的创作》;伊林柯夫的《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等。至此,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主要内容,辅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哲学"传统体系"阐释范式得以全面确立并发展到一个高度。

二是"问题意识"下的系统反思。现有的哲学发展史表明,体系的建构与反思往往相伴而生。正是持续不断的"不破不立",赋予哲学以鲜活的思想形式而非僵化的封闭系统,从而使之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经久不衰。伴随着《资本论》哲学"传统体系"阐释范式产生深刻影响,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两种反思范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嫁接"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去蔽"——已然成型。前一种范式主要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下,阐释《资本论》的时代意义;后一种范式则侧重于重要范畴的维度,诠释《资本论》之于重大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资本论》哲学"问题意识"反思范式的产生,表征着 20 世纪哲学思维的巨大变革,特别是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分野、对峙、交融,凝结着人们在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和制度变迁的社会境况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时代使命的思考。

概括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论》哲学研究的主要代表性观点有:《资本论》中的"总体性方法"和超越物化意识的历史辩证法等,对于把握和理解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卢卡奇);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为《资本论》的方法论基础(柯尔施、葛兰西);用《资本论》中的观点和方法来批判生产与消费的组织化这一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法兰克福学派);以《资本论》的科学历史理论同人本主义思潮相抗衡(阿尔都塞);从社会生产理论出发,探究世界历史与全球化问题,彰显《资本论》于资本生产空间布局中的思想统摄力(哈维、杰姆逊、鲍德里亚)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对过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别的总称。例如,以马尔科维奇为主要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7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 页。

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沙夫为主要代表的波兰“哲学人文学派”,以马赫维奇为主要代表的捷克“存在人类学派”,以赫勒为主要代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等。在当时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共同背景下,围绕《资本论》哲学研究,这些思想家们致力于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深刻论述了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异化”和“实践”等问题。

三是“学理构建”中的多元拓展。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马克思学”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纂原则逐渐兴起。它们旨在破除意识形态偏见和单一学科局限,使得《资本论》研究的“学理建构”趋势愈发明显。2012 年,$MEGA^2$ 第Ⅱ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15 卷 23 册)的全部出齐,颠覆了把《资本论》视为已完成著作的传统观点。基于扎实的文献研究,国外学者提炼出《资本论》中不断“生成”和变化着的若干哲学思想,诸如社会有机体及其结构、历史形态与历史诠释之间关系、“现实的个人”的处境和未来发展等。显然,这种“学理建构”拓展范式有助于对过去相关研究的“纠偏”。然而,“纠偏”却也容易导致走向极端。一旦把握不准文献的基础地位,刻意拔高版本考证之于《资本论》哲学研究的作用,势必产生偏颇之言乃至荒谬之论。以史为鉴,有国外学者曾以恩格斯对《资本论》二、三卷的修订情况为研究对象,得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不当结论。“为文献而文献”是一种典型的本末倒置行为。唯有版本考证与文本解读的有机结合、思想阐释与体系建构的辩证统一,才是《资本论》哲学“学理建构”的正确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辩证法学派”的《资本论》研究,已成为一个学术热点。该学派在与当时盛行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坚持将黑格尔辩证法作为理解《资本论》思想的重要抓手。进入 21 世纪,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重新唤起《资本论》研究的热潮下,“新辩证法学派”不仅立足于厘清《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及理论难点,还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未来做出了积极回应。其主要观点有:将辩证法归结为用范畴来把握现实的方法论工具,而不是适用于全部社会形式和自然状态的普遍规律,进而成为理解《资本论》要义的“锁钥”;强调黑格尔的逻辑学而非历史哲学对《资本论》叙述方式的关键性作用;指明应该注重结合《资本论》及其手稿来阐释其哲学和经济学内涵等。

同国外《资本论》哲学研究的主要范式及其成果相比,国内的相关研究亦不遑多让。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传统体系”阐释范式的影响下,以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吴传启的《〈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等为代表的理论成果,围绕《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主要范畴、唯物史观、辩证法思想、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者突破了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束缚,极大地拓展了《资本论》哲学的研究空间。一方面,通过重思物质生产的基础作用、再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论证社会有机体思想等,不断丰富《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内涵,并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维度对其加以审视。另一方面,以实践的主体性为起点,对《资本论》中的社会存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等做出了全新探讨。这些研究成果看似是“问题意识”反思范式的“衍生物”,实则已经包含了中国的“本土逻辑”,体现着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

21 世纪以来,国内《资本论》哲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突破了检验与运用唯物史观的狭窄视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视域下,复归《资本论》作为思想著作而非单一学科著作的定位。以此为基础,从理论旨趣、方法论、辩证法、话语革命、资本逻辑、现代性、中国道路、文明新形态等全方位角度,引领《资本论》哲学持续成为历年的学术热点。如果说,国外《资本论》哲学研究愈发由于注重学理而弱化思想,那么,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则构筑于中国道路的实践上愈加彰显“鲜活”的思想。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对其基本立场的坚持,理应借此不断深化。

二、文本思想与中国道路的有机结合

研究的基本立场决定着研究对象的范围。在比较研究中彰显出中国特色,内在地要求中国特色

《资本论》哲学研究,绝不能局限于文本层面即《资本论》及其手稿,而应将文本思想与中国道路有机结合起来。

审视国外《资本论》哲学主要研究范式的不足之处,可以看出“原理化”“条块化”“形而上学化”“封闭化”为其主要表现:将《资本论》中的论断、表述、命题“提升”为“原理”,用以指导社会现实生活;用现代学科划分“肢解”《资本论》的整体思想,乐此不疲于学科归属之类的形式争论,以致不再关注思想本身;诉诸纯粹的概念、抽象的问题、特定的原理,把《资本论》“重建”为观念论意义上的哲学著作;将《资本论》的思想阐释限定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缺乏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大视野等。纵然国外的一些相关研究范式始终没有脱离围绕现实问题来“发掘”《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却因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而搁浅乃至倒退:要么把由“元问题”生成的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原理体系,直接推广运用到《资本论》对现实问题的“外部阐释”;要么在提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时,牵强比附地引用《资本论》中的“只言片语”。相较而言,中国道路的实践发展则为《资本论》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与源源不断的动力。

以文本思想与中国道路的有机结合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前提,是这两者之间的同构性。无须赘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单论开放性与发展性的共同特质,即可证实中国道路与《资本论》思想的内在契合。

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从未将《资本论》看作是一部成型的著作,遑论使用单一的学科划分来界定它的性质。除却给人在第一阅读印象上的经济学著作,或者一些理论工作者所给予哲学著作定性,恐怕很少有人把《资本论》同文学著作或艺术作品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自其思想起源期受到启蒙主义、人道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时起,马克思一直自视为现实洞察力完全超越个人偏见的作家、用辩证法来写诗的人、充满创造力的艺术家。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这样描述《资本论》:“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他的方法一般比较适用于那些没有辩证结构的著作。”①正如维纳斯的断臂之美一样,《资本论》的“未完成”性才是对整个现实世界的完美写照。

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初版行将问世之际,历经数十年呕心沥血的马克思非但没有过多强调它的重要价值,反而平静地向恩格斯表达了阅读巴尔扎克短篇小说《玄妙的杰作》的建议,让其体悟小说中的“值得玩味的讽刺”②。根据拉法格的回忆,这篇小说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论》创作历程的写照。在小说《玄妙的杰作》中,画家弗朗霍费为了作品的臻于完美而反复修改,却始终无法达到“光荣的最后一步”,最终在被他人误解为涂鸦的悲愤中自杀身亡并且将全部作品付之一炬。与之相似,马克思孜孜矻矻于《资本论》的写作,屡屡回绝各种先睹为快的请求。每当进行到最后的加工时,都进展得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的问题,引起新的考虑”③。出于《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真实揭露被难以理解的担忧,马克思在准备让这部杰作接受公众审视之时想起巴尔扎克的小说绝非偶然。

除了追求完美而导致自我毁灭之外,《玄妙的杰作》反讽意味的更深层表现是,弗朗霍费最后展现的杰作风格于其生前被贬低为“涂鸦”,却在几个世纪后成为风靡一时的印象派画风的代表。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在特定时代中只看到混沌和散乱的地方,或许不远之时将表现出清晰和统一。《资本论》的“未完成”性、开放性、发展性,特别是成型过程中留待破解的疑惑及困境,使它得以同其身后的时代发生“接触”,从而超越那些仍属于且只适用于 19 世纪的著述而历久弥新。在早已大致写下《资本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23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8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149 页。

第二、三卷初稿的情况下,马克思直至逝世亦未能完成定稿。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这一著作的写作构想。相反,从思想史的维度来看,关注资本主义世界新变化、参与西欧工人运动、求解资本主义“史前史”、探究东方社会的未来走向等,马克思的这一系列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在秉承《资本论》中对现代社会及其结构的理解的基础上,“更加突显了他与 20 世纪东西方社会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运演)具有多元、复杂而深刻的关联”①。

按照文本类型划分,“未完成”的《资本论》主要包括笔记、手稿、定稿、书信。其中,以摘录和批判他人著述而形成自己思路为主的笔记,作为马克思正式创作《资本论》前的准备材料,涉及《资本论》中的绝大多数议题,有助于厘清贯穿于此的逻辑方法和叙述结构。《资本论》手稿主要由马克思的手稿和恩格斯的修改整理稿组成,前者囊括了《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手稿,后者则将恩格斯的相关评论与考证以及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整理和修改包罗在内。所谓《资本论》定稿,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出版的《资本论》各卷次及其不同版本。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道之间就《资本论》创作进行的通信,也是《资本论》的重要组成文本。这些文本直观呈现出马克思的艰辛写作历程和其同道者参与思想建构的过程,为全面而准确地理解《资本论》思想提供了重要参照。

对于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来说,这些文本中的每一个都是不可或缺的。以《资本论》第一卷的不同版本为例,其各自“独立的科学价值”②,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情形、读者和受众的国别理解差异,做出的用词修改、文体变动、章节调整、内容增加;而且指向他对《资本论》思想影响方式的定位,即不能作为理解人类社会历史走向和指引特定民族发展道路的“万能钥匙”,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历史诸象作深入分析和比较研究。又如,通过梳理《资本论》的不同文本,可以得出关于其叙述结构嬗变的清晰脉络:“两卷本著作”—“三本书构想”—“五个分篇”—“六册计划”—“九项内容”—“三卷四册结构”。叙述结构由简单到丰富再到集中的变化,在深刻揭示资本逻辑所主导的现代社会运动规律的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理论发展空间。从内容上看,马克思虽然放弃“六册计划”转而集中探讨“资本一般”问题,但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内容是无法回避的。如何处理这些内容,是插入《资本论》三卷本中,还是另辟新作?马克思本人对此并未给出明确答案,故而成为后人进行思想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作为现代社会结构的轴心,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资本论》的一大主题,对它的把握构成现代化进程中绕不开的环节。由此可见,《资本论》的开放性与发展性体现为同现代化进程相并行。从世界历史的维度审视中国道路,它是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在这个开放的和发展的过程中,解放劳动和驾驭资本是其必然的使命与任务。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出发,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不动摇,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完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范资本逻辑,提高驾驭资本的能力……凡此种种,不正是中国道路与《资本论》思想有机结合的真实写照吗?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于劳动、资本、国家所构成的现代社会复杂系统中,开辟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续写着《资本论》的新时代篇章。

---

① 聂锦芳:《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定稿工作——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50 周年》,《中华读书报》,2017 年 9 月 6 日 10 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 页。

三、现实问题导向下的方法论提炼

以文本思想与中国道路的有机结合为研究对象,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论作为支撑。如前所述,远未切中现实问题的深处,是国外《资本论》哲学研究的一大症结。实现“未完成”的文本思想和开放的、发展的中国道路之间的统一,即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统一,须以提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为真正起点及内在动力。脱离了现实问题的导向作用,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终将因不得其道而沦为一纸空谈。

哲学意义上的“现实”,通俗地讲就是“事实”和“本质”的结合,而这里的“本质”即为“思想”。因此,“思想”和“现实”是同一事物的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从“现实”的哲学内涵来重新界定《资本论》,它绝不只是抽象的理论表达,或者马克思关于自身生命体验这一经验事实的总结,而是他对其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的提炼、分析、解答,更是对几乎贯穿人类全部时代的基本现实问题——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入探究。

在现实问题的导向下,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实现,应首先回溯《资本论》的创作历程,明晰当时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状况,以便厘清其中的主要现实问题;再将《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与之进行对照,检视这些论述是否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可否全面而客观地呈现出现实问题、有未清楚地意识到现实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形成独到而深刻的解决思路等;最后提炼出蕴含其中的、可以上升到方法论层面的思想观点。除此之外,《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这一现实问题的理论表达,理应置于其所处时代的思想图景及各种错综复杂的理论事件中加以考察。只有在同马克思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的思潮,如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社会主义学说等,对同一现实问题的不同阐释的比较中,乃至将比较研究扩展到马克思之后的思想史演进和社会实践发展,《资本论》才能彰显出思想的超越性与深邃性。时空的巨大变迁使人们无法从《资本论》中寻得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然而,现时代仍未脱离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这又决定了《资本论》能够为诠释和把握现时代的现实问题提供重要的方法借鉴。循此思路,不难将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资本论》方法论,归结为以下几个递进的层面:

其一,通过全面梳理《资本论》的创作史,确证现实问题转变之于《资本论》内在逻辑与叙述结构变迁的决定性。“未完成”的《资本论》是马克思根据现实问题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开放结构。从第一卷不同版本的篇章划分——德文一版的六章结构、德文二版的七篇二十五章结构、法文一版和英文一版的七篇三十三章结构——中可见一斑。至于马克思没有完成《资本论》第二、三卷定稿的原因,除却身体健康方面之外,并非晚年思维能力下降、严重低估自身拖延症等,而是现实问题的深刻变化大大超过了其原有构想。以 19 世纪英国资本主义为典型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过程,虽然势必波及西欧社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但由此揭示的现代社会发展规律不能完全适用于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事实上,1873 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历时数年仍未达到顶点,并且随着各种货币政策的调整而得到不断缓解,始终无法发展到“引爆”无产阶级革命的程度。巴黎公社的失败则表明国际性的组织形式已成为工人运动的桎梏,加之各种错误思潮的“混淆视听”,使得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低谷。于是,马克思将研究视野拓展到资本主义的“史前史”,通过剖析西欧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不同民族国家发展历程,揭示出经济力量、政治制度、宗教观念、伦理道德、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之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塑造作用,实现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哲学基础的反思与重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重点关注东方社会尤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道路问题,分析指出了落后的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如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排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利影响方面、内部自我革命的推动和整个欧洲革命的支持,并着重强调了《资本论》的解释限度。在马克思看来,全然无视不同民族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把《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

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①,非但无助于对历史诸象的诠释,反而由于超历史性而无法达到成为历史哲学的目的。

其二,基于对《资本论》主要内容的细致解读与条分缕析,提炼马克思围绕现实问题进行探讨所形成的方法论。不联系现实问题,仅从单一的学科划分及其研究方法出发,去衡量《资本论》中描绘的社会历史图景,势必陷入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表面看来,货币是社会财富的象征符号、司空见惯的经济现象。但它实际上可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转化为具有强大创生力量的资本,成为折射社会各阶层之生存境遇和历史命运的事物。货币的外在形式转换及内在关系演变,本身作为现实问题而存在。同样,商品、价值形式、雇佣劳动、资本一般、资本特殊、所有权、原始积累等,亦非简单的经济范畴,而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在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分析中,凝结着马克思的深邃思考,形成了上升为方法论层面的观点。举凡:现实的个人及其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物质生产,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经济范畴与具体实在不是直接的“生成”的关系,而是包括简单范畴与具体范畴的辩证关系、经济范畴之于一定社会形式的适用性、相同的经济范畴在不同社会形式中的差别等方面;观照与把握现代社会复杂系统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生产总体辩证法;从社会有机体的维度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以便缩短或减轻社会变革带来的“阵痛”;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

从《资本论》的现实问题分析中提炼出方法论,还能够诉诸和马克思处于同时代的思想家的比较研究。例如,怎样看待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进而实现它们的内在整合,是马克思、黑格尔、斯密、李嘉图等面临的共同现实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这里必须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②黑格尔没有像斯密那样用道德哲学统摄政治经济学,转而以作为伦理精神之内在规定的自由为主线,将家庭、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统一起来,从而具有强大的历史感。这种从同历史的一定联系中加工经济学材料的“宏大叙事”,虽把思想演进与历史发展的真正关系“头足颠倒”,却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马克思将上述“合理内核”从其唯心主义“外壳”中剥离出来,把辩证法在其正确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并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得出了一个不亚于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成果。这一成果既有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的佐证,又蕴含着历史如何引领现实的深层意义,诸如历史在客观性与规律性的决定下如何彰显自身的本来面貌,历史以何种方式进行叙述才能更好地实现和现时代的有效接榫,源于实践的理论何以作出有别于历史的表达从而显现真正意旨等。

其三,借鉴《资本论》中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对不同社会历史现象的比较研究,求索当今现实问题的破解之道。早在《资本论》最初获得广泛影响力的时候,马克思就觉察到把它归结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后果,并据此强调不同社会历史条件的具体分析之于《资本论》方法借鉴的重要性。同理可知,系统考察迥异而复杂的社会环境,是结合《资本论》求解当今现实问题的前提。从社会历史发展与文明形态演进的角度来看,《资本论》力图解决这样的现实问题:当资本主义社会在当时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方式出现时,为什么是资本获得了独立性而不是现实的个人实现其自由个性?如何变革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面对资本逻辑仍然主导人类生活的现实问题,进一步追问资本的本性为何、是否需要资本、如何驾驭资本逻辑、人工智能与资本逻辑的关系几何、生态文明发展何以摆脱资本的支配、人的自由个性将何去何从等,皆可以充分借鉴《资本论》中的相关探讨。

其四,结合资本主义批判史、全球化趋势、中国道路等现实问题,重释《资本论》的当代价值。《资本论》将资本批判这一现实问题推向了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顶峰。其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变化,使人们从未停止对资本的剖析与批判。在传承《资本论》中资本批判之“锋芒”的同时,人们也深刻认识到资本的各种调整、转型乃至变异。如此一来,应当把《资本论》置于资本批判的整个思想发展序列中,充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6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01 页。

彰显出马克思所实现的思想变革的当代价值。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态势,直接关乎《资本论》理论地位的重估。《资本论》中涉及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三位一体”公式、资本的本性、现代社会结构等现实问题,仍然浮现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相比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上述问题的实际后果、经济根源和社会本质,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差别。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对先进技术的垄断,跨国公司、国际资本造就出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由此可见,《资本论》中的现实问题分析,至今仍具有广阔的理论价值空间。

不仅如此,中国道路之世界历史意义的逐步显现,还迫切要求我们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发展路径,揭示出其中蕴含的新特点、新作用、新趋势,把实践经验升华为思想建树。这无疑为重新检视《资本论》的当代意义,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方面通过对现代社会及其结构的全面剖析,揭示出由资本逻辑“生成”并主导的现代化的特点和趋势;另一方面系统诠释了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双刃”作用,为扬弃这一文明形态,使人真正地占有现代生产力的总和,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从社会变迁、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相统一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国道路这一现实问题的不同表述。中国式现代化之新特性,首先在于不再像传统现代化那样只注重物质积累,也不似西方现代化那般依靠剥削来实现物质积累,而在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融合,更在于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文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之间的协调发展,从而为《资本论》的思想延续与价值重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以实现世界历史意义为思想意旨

正如一般的哲学原理所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中国特色只有在置于世界历史中并产生意义后才具有完整的形态。这就是说,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应以实现世界历史意义为思想意旨。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世界历史不是观念演进或精神发展的历史,而是真实存在的社会运动;它所呈现的是社会发展的重大趋向即规律,绝非过去全部历史事件的罗列;其动力不在于抽象的绝对观念、纯粹的自我意识、先验的自然秩序,而在于现实的个人的生产方式与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下,各民族的封闭状态与自然分工逐渐被彻底消灭,历史也随之演变为世界历史。一言以蔽之,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例如,英国的某项新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如果导致大量印度劳动者失业,进而引起该国整个生存方式的改变,就是一个世界历史事件。同样,砂糖、咖啡等生活用品的匮乏与涨价,直接引发 1813 年德国反对拿破仑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单个的个人的活动越是具有世界历史性,他越是受到异己的世界市场力量所支配。相应之下,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消灭私有制、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项事业。

从世界历史的观点出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动力、条件、矛盾、走向。他分析说,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虽然离不开封建社会的财富积累,但直接取决于世界性的殖民扩张和奴隶贸易带来的资本原始积累。就此意义而言,资本主义时代正式始于 16 世纪,尽管 14 世纪至 15 世纪的一些地中海沿岸城市中存在着稀疏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从本质上来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①。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一方面把民族社会内部所有的劳动形式都变成雇佣劳动,打破了行会与地域性对生产和交换的全部限制;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主导的生产方式,力图使一切生产方式皆置于它的逻辑支配下。世界市场与资本逻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8 页。

相辅相成,对外贸易的扩大,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幼年时期”的基础,又是这种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不仅促进了资源于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配置,而且保障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有效运行。

与此同时,资本本性与对外贸易的相得益彰中也包含着矛盾,并突出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即价值规律作用于国际交换中所形成的新的剥削形式。受供求关系波动较小、生产要素流动缓慢等因素的影响,拥有较高劳动生产率和雄厚资本的发达国家,可以在不付出任何交换代价下不断攫取落后国家的一部分剩余劳动。换言之,伴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对立,势必扩及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于是,国际性的经济危机和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呼之欲出”。国际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加深,尽管必须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强制平衡,即在造成极大破坏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得到适当调整,但是最终表征着资本逻辑的矛盾顶点,预示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正如马克思反复强调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①

除了丰富与深化世界历史理论之外,《资本论》还以思想建构的方式“参与”着现代世界历史的进程。首先,《资本论》在部分肯定资本主义文明之进步性的基础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对立和拜物教现象的实质,历史性地终结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及其理论表现——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其次,《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文明之于现代社会建构意义的适度认可、对资本主义发展长期性的客观判断、对资本的深刻批判,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与之相适应,以庸俗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借鉴马克思的批判性资源,强调工业文明及技术进步对劳资对立的有效对抗。当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限度,即工业文明和技术进步自身属于资本批判的范围,早已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洞察,从《资本论》第一卷的“机器与大工业”章中可见一斑。再次,《资本论》的思想影响业已拓展到东方社会,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资本论》原有构想的突破,实现了同资本逻辑主导的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抗争的胜利,证实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然性。再者,作为《资本论》“未完成”性的表现之一,马克思在求解资本主义“史前史”的过程中,考察经济、政治、宗教等多元因素对资本主义文明起源的推动作用,可以接轨于西方社会文化的后现代转型。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即为很好的例证。最后,迅猛推进的全球化态势仍属于资本开辟的世界历史进程,加之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佐证和重新唤醒《资本论》发挥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

诚然,全球化的实质并没有随着不同阶段的表现方式而发生根本的变化,仍基本上处于《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但是,中国道路这一全球化进程中的具体事物,包含着驾驭资本逻辑、解决其内在矛盾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中国道路在积极融入全球化趋势的同时,始终坚持自主发展,有效地避免了随波逐流所导致的现代化转型的“阵痛”。中国道路的基本特色绝不意味着走别人的“老路”、照搬照抄他国经验,更不是完全独立于世界历史之外。中国道路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准确地把握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既充分汲取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不掉队”的必要保障;又在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下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道路中形成的丰富而深邃的思想建树,尤其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的世界文明观,反映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为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不论《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参与”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方式,还是中国道路的实践经验和思想建树的世界历史意义,都应当成为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实现其思想意旨的题中应有之义。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近年来围绕《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从文本语境、基本方位、主要内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176 页。

容、现实意义等方面,做出了系统而深刻的阐释,形成了许多颇有建树的理论观点。例如:《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再研究的基础文献与基本原则;唯物史观的深化与《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资本论》反思资本全球化“幽灵”所昭示的交往实践视域;《资本论》对“资本之谜”“世界历史之谜”的破解;《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之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转折性地位;《资本论》的世界历史思想究其实为一个潜在的整体;《资本论》对现代世界及现实历史的影响等。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应充分吸收这些既有成果并作进一步深化。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ilosophical Study on *Das Kapital*

Yang Hongyua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fforts of the theorists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the philosophical study of *Das Kapital* in China has got the tendency to make rapid development like setting the prairie ablaze. In many respects such as themes, methodologies, contents, viewpoints and achievements, the philosophical study of *Das Kapital* in China has got its own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As a professional research field, the philosophical study of *Das Kapita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es basic standpoint, research object, main methodology, theoretical purpose, and other elements.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its basic standpoint depends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hina's Road. It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some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intellectual dialogues, but also based on th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civiliza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Otherwise, the philosophical study of *Das Kapita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ould become a closed and rigid system. In terms of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and development, China's Road is intern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thought of *Das Kapital*. Accordingly,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the philosophical study of *Das Kapita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notes, manuscripts, final drafts and letters in connection with *Das Kapital*, but also include the tes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Road to the ideological essences of *Das Kapital*.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ext thought and China's Road depends on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problems of reality and the resulting methodological basis, such as the changes of internal logic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methods of observing and grasping society and history, the ways to solve the present-day problems of reality, an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revaluation of *Das Kapital*. "Reality" here is a concept used in the philosophical sense. In short, it refers to the synthesis of facts and essences. Moreover, only when the philosophical study of *Das Kapita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plac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and becomes significant, it can come into complete shape. No matter whether it related to 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in *Das Kapital*, the way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or the practice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China's Road, the content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philosophical study of *Das Kapita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purpose of realizing its ideological intention.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scholars have made systematic and profound explanations on 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in *Das Kapital*. In terms of text context, basic orientation, main content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many fruitful viewpoints have been generated. The philosophical study of *Das Kapita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fully draw from thes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Das Kapit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Road; problem of reality; world history

(责任编辑　　刘曙光)